

《河岳英灵集》版本考

〔美〕李珍华 傅璇琮

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是唐人选唐诗的一种，但它不是一部寻常的诗歌选本，在中国诗歌史和文学理论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从文献材料上说，由于它的选录，保存了若干唐人的诗（其中如贺兰进明、李崱等几位诗人，《全唐诗》据《唐诗纪事》采录，《唐诗纪事》则采自《河岳英灵集》）。它的理论上的价值更加明显。它所提出的兴象说、音律说，鲜明地反映了盛唐时代诗歌高峰期的创作特色和理论特色。殷璠与王昌龄，是开元、天宝时期最具理论系统的诗论家。

但长时期来，这两位诗论家的意义却得不到足够的认识。原因在于研究不足。对于殷璠与王昌龄的研究，需要从理论探讨与文献整理两方面入手，缺一不可。王昌龄，一般都把他单纯地视为有特出成就的诗人，而忽略他还有很成系统的、极有独创的诗论；他的《诗格》长时期中被认为伪作，原因即在于没有对《诗格》本身进行实实在在的清理。对于《河岳英灵集》，近些年来已逐渐引起注意，有几位研究者作出了很好的成绩。但以往的研究似还只限于几个侧面，更为不足的，则是对《河岳英灵集》本身缺乏认真的清理，以致长时期来没有能为研究者提供一种较为信实可靠的本子。

殷璠所编的这部诗选，他自己说是两卷，宋代的公私书目，也都作同样的记述。但从明代开始，却著录成三卷，一些有名的

刻书家，也按三卷本刻印，两卷本的原始面貌也就鲜为人知，一般遂以为《河岳英灵集》原本就是三卷，以致清朝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它与钟惺的《诗品》相并比，说钟惺《诗品》分上中下三品，含有高下抑扬之意，殷璠此书既然分为三卷，当也有同样的含义。这就造成了评价上的极大误解。而在文献整理上，自从三卷本流行，一般也就根据这三卷本来对诗人的作品进行文字上的校勘。本世纪五十年代，现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印了一套《唐人选唐诗（十种）》。这部书的印行曾起到材料普及的作用，对研究者提供较大的方便。但也有很大的不足，即底本选择不严，校勘不细，如《搜玉小集》等几种都有这种缺陷，而问题最大的则是《河岳英灵集》。它不选择较原始的二卷本，却选择后起的三卷本（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刊本），书后虽附有临毛斧季、何义门的校记，却缺漏极多。而因为自从五十年代以来就仅仅印行了这一部《唐人选唐诗》，于是研究者在作文献整理时即据此作为版本的依据。这里不妨举一个小例子：近年巴蜀书社出版了王仲镛先生的《唐诗纪事校笺》，这是一部很见工力的著作，也是这些年唐诗学研究的一大收获。但王先生在据《河岳英灵集》校勘时，也仅据这部五十年代印行的本子。这样，就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作异文校时，校记中说《河岳英灵集》与《唐诗纪事》不同，作某某，但实际上宋刊本《河岳英灵集》恰恰不作某某，而同于所校的文字。如果读者不再据宋刊二卷本校对，也就信以为是，这就在文献整理上造成新的误解。

殷璠在书前的《叙》中，说他这部诗选所收，计诗人二十四人，诗作二百三十四首，分为上下卷。这是他的自述，应当是可信的，但在此后历朝的记载中，这几个数字却颇有歧异。如《文苑英华》卷七一二所载《河岳英灵集·叙》，作三十五人，一百七十首。以今所存各本《河》集统计，及《文镜秘府论》南卷

《定位》所载《叙》，都是二十四人，较为一致；应当说《文苑英华》作三十五人，与此出入太大，恐不足信。诗篇则各本及《文镜秘府论》所载《叙》，都作二百三十四首，而以今存各本实际统计，仅为二百三十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殷璠所作的张谓评语中曾举出《代北州老翁答》与《湖上对酒行》两诗的篇名，而集中但有《湖上对酒行》，无《代北州老翁答》，因此“疑传写有所脱佚”。这一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虽然我们注意到赵士炜《宋中兴馆阁书目辑要》卷五中引《玉海》卷五十九，称其所收诗“总二百三十首”，与今存各本实际所收诗一致，但南宋的《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还是称“集常建等诗二百三十四首”。“二百三十四”这一数目，各书、各本所载如此一致，而又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出的疑问，使人觉得或许《叙》中的“二百三十四首”确是殷氏原文，而现在所存各本之所以仅为二百三十首，则可能是因流传过程中有所脱漏。

问题最大的还是卷数的差异。殷璠的自叙明说“分为上下卷”，《新唐书·艺文志》总集类也载《河岳英灵集》二卷，《直斋书录解题》同。而《四库全书总目》作三卷，《提要》中也就三卷之分作出解释，说是“毋亦隐寓钟嵘三品之意乎”，也就是说钟嵘《诗品》中分上中下三品，殷璠的书作三卷，对所选诗人也含有抑扬之意。

《提要》的这一说法曾招致后人的讥评。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黄丕烈得到一部毛斧季（扆）手校的三卷本，认为与《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卷数相合，于是说：“近人撰集书目，仅据俗本分卷之三而为之说，曰推测其意似以三卷分上中下三品，实啻痴人说梦。古书可贵，即此可见。”这里所说的“近人撰集书目”，即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言，但因《提要》系奉旨撰集，时间又相近，不能明说，故只好以“近人”称之，但“痴人说梦”云云，已够不客气的了。近代学者余嘉锡又

进一步申论，其所著《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四谓：“璠序云：‘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然则璠意中本无高下之分，即令有之，于其所举三人，亦是相提并论，而今本王维在卷上，昌龄、光羲乃在卷中，若以此为三品，岂璠之意乎？”

黄、余二氏之说甚是，由此我们明确了这样一点，即《河岳英灵集》原为二卷，以后才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变成为三卷，其时间当在宋元之间或元明之间。

殷璠自己说“分为上下卷”，这是没有问题的。《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題》以及《中兴馆阁书目》都作二卷，可见北宋至南宋中期，《河岳英灵集》流传于世的，都是二卷本，未有作三卷的。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与陈振孙同时的晁公武，在其所记颇为丰赡的藏书记中已无《河岳英灵集》的著录（见《郡斋读书志》）。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亦未有记载。

《文献通考·经籍考》虽有记录，且也作三卷，但马氏仅引陈振孙语，不能证明马氏实际见过此书。由此也可见二卷本的《河岳英灵集》在南宋中期已经流传不多了。

今所见的二卷本《河岳英灵集》，都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善本部。一为明清之际的季振宜所藏，一册，首尾有缺叶，抄配，又缺《叙》、《集论》、目录。卷末有季氏题款：“泰兴季振宜沧苇氏珍藏”，并朱色方印“季振宜印”。每叶十行，每行十八字。另一为清末莫友芝所藏据毛斧季校本过录的本子，二册，

《叙》、《集论》、目录都全，卷末有“丙寅初冬邵亭校读一过”十字。丙寅为同治五年（1866）。此书亦为每叶十行，每行十八字。此二书经过我们仔细核对，可以确定是同一个本子，即都是宋刻。两书中，崔署的署字缺末笔，又署诗《宿大通和尚塔敬赠如阁梨广心长孙铸二山人》之敬字缺末笔。又如高适《哭单父梁九少府》“一官恒自哂”，恒字缺末笔；储光羲《使过弹筝

峡作》“苦节不可贞”，贞字缺末笔；储光羲《杂诗》“达士志寥廓”、王昌龄《东京府县诸公与蔡母潜李颀送至白马寺宿》“南风开长廓”之廓字，都缺末笔。按用缺末笔避讳始于唐代，但唐代避讳的法令较宽，至宋代始严，不但避今上讳，还避本朝前几世皇帝嫌名。宋绍熙（1228—1233）礼部韵略，卷首犹载淳熙（1174—1189）、绍熙（1190—1194）时应避旧讳及诸帝嫌名，有过五十字以上者（参陈垣《史讳举例》卷八《宋讳例》）。以上所举几处缺笔，署字避英宗讳，敬字避太祖之祖敬名讳，恒字避钦宗讳，贞字避仁宗讳，都属北宋，廓字避宁宗扩嫌名。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宋太宗实录》云：“《宋太宗实录》八十卷，今吴门黄孝廉蕘圃所藏，仅十二卷，且有脱叶。每卷末有书写人及初对覆对姓名，书法精妙，纸墨亦古。于宋讳皆有缺笔，即慎、敦、廓、筠诸字亦然。予决为南宋馆阁抄本，以避讳验之，当在理宗朝也。”二卷本的《河岳英灵集》与钱大昕此处所说有类似之处，廓字避宁宗（1195—1224）讳，则其书之刻不会在此之前，这时距南宋之亡（1279），已经不远。

在这之后，即不见有二卷本的著录。明代有两位著名藏书家，是真正记录他们所过目并收藏的图书的，一是陈第，一是高儒。但经查核，陈第的《世善堂藏书目》未见著录，高儒的《百川书志》记有《河岳英灵集》，作三卷，但又说“旧分二卷”（卷十九总集）。黄虞稷、周在浚所作《征刻唐宋秘书书目略说》，谓《百川书志》乃“志其家藏书，如晁公武之例”。高儒为明嘉靖时人，当明中叶。这或许是现在所见最早著录三卷本的书目，可见在明代中期，《河岳英灵集》流传于世的，已是三卷本了。

在此稍后，即毛晋汲古阁刻的三卷本。毛晋为明末江南有名的藏书家兼刻书家，家富于财，以所购宋元旧本之多且精名于世。但后世也有对他提出批评的，叶德辉《书林清话》好几处提

到汲古阁刻书的弊病，如说：“然其刻书不据所藏宋元旧本，校勘亦不甚精”；“孙从添《藏书纪要》又云，毛氏所刻甚繁，好者仅数种”；“堯圃尝云，汲古阁刻书富矣，每见所藏底本极精，曾不校，反多臆改，殊为恨事”（卷七《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一）。毛晋是否收藏有二卷本的《河岳英灵集》，不得而知，但其所刻为三卷本，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六称其所藏南宋本，“字句与毛本小有异同”，其实所异还是不小的。除了文字歧异外，如宋本孟浩然《夜渡湘江》、《渡湘江问舟中人》两诗，毛晋的本子都移作崔署诗；王昌龄的《咏史》、《观江淮名山图》两首五言古诗，毛晋的本子与莫氏藏书，十之八九的文字不同。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中也说：“宋本序后有《集论》一首，孟浩然诗有《送张子容》一首，均为汲古阁本所无。诸家评语中，如崔颢、孟浩然文颇有异，綦毋潜小序尤迥然不合。其他单词只字，更难以俚指计。盖自明代翻刻以后，沿讹袭谬，已匪一日矣。”（卷十九）笔者怀疑毛晋得见的《河岳英灵集》，恐怕即是《百川书志》所著录的在明代传世的三卷本。

毛晋之后，其子扆又曾翻刻过一次，也是三卷本，但这是毛扆从一旧钞本校过的，后又为黄丕烈所得，今藏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卷首有黄氏乾隆癸丑（乾隆五十八年，1793）题识，称：“东城任蒋桥顾氏，藏书旧家也。余从其族中得来佳本最多。一日藏书尽散，书友捆载而归，邀阅之，悉为其家藏书之下乘，旧刻名钞，无一存者。惟此本系汲古主人手校本，急检出，以贱直易之，沧海遗珠，竟为象罔所得，喜何为之。”黄氏所述得书缘由甚为详明。此书卷末有毛扆题字，云“壬戌五月廿一日从旧钞本校一过。毛扆。”毛扆生于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壬戌当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上面引过的黄丕烈甲寅年（1794）跋，也说此“系汲古主人毛斧季手校本，渠所据云是旧钞本，集中改正处尚未细审是否，即其分卷之妙，已为可珍。”从这里可以见

出，毛扆所谓旧钞本，乃二卷本，这是毛晋未得见而为毛扆所得的。但毛扆并未据此旧钞本翻刻，而仅以校汲古阁刻本，且所校又相当疏略。

较毛扆稍晚，大略同时的何焯（义门），也是见过二卷本的，并作过认真的批校。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有一部明崇祯元年毛氏汲古阁刻本的《唐人选唐诗》八种，其中的《河岳英灵集》有傅增湘临何焯批校。集末有何焯跋：“丁丑仲夏承筐书塾阅。郑都官于殷、高二子深致抑扬，然未足为商、周也。焯。”何焯对殷璠选诗的标准颇有不满，对《河岳英灵集》评价不高，此点笔者已有另文论到，这里不再详谈。何焯卒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丁丑当为康熙三十六年（1697）。这也是毛扆用二卷的旧钞本校汲古阁本之后的十五年。《书林清话》卷七《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四曾记云：“毛氏汲古阁藏书，当时欲售之潘稼堂太史来，以议价不果，后遂归季沧苇御史振宜。黄丕烈《士礼居丛书》中所刻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所载价目，即其出售时所录也。”按季振宜于清初亦为藏书名家，其书大多得之于毛氏汲古阁、钱氏述古堂。今存《季沧苇藏书目录》，书中“宋板书”，即有《河岳英灵集》上下二卷，一册，当即此本。笔者怀疑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季氏所藏的二卷本《河岳英灵集》，其残缺部分抄写补配者，可能即毛扆所得以校勘的二卷钞写本。

现在再说何焯的批校。何焯的工作计有两项，一是批，二是校。批是何焯对殷璠选目的意见，以及对所选诗的评价，传世的《义门读书记》未曾收载，其实是研究何焯思想的很好材料，可以辑入《读书记》的，这里暂不详谈。何焯的校语极少，据傅增湘所临，绝大部分是在汲古阁本上的有关文字旁注字，或画圈，即他认为有异文可并参的，在旁注字，认为有误的，画去本字，旁注正确的字。笔者曾据以通校莫友芝所藏的宋本，发现何焯所据以与汲本相校的，即为二卷的宋刻本，凡汲本与宋本相异的，何

氏都一一勾出，不管他认为宋本正误与否。他的目的似乎是纯粹的对校，旨在标明两本的异同，并不想加以意断。而由此例提供我们一个证据，即何焯是见到过二卷本的宋刻的。此书卷末有藏园翁的跋，说：“丙辰正月借木师所藏义门批本移写，三日而毕。”丙辰为1916年。《藏园群书题记》也说：“此集义门所据似是钞本，故篇中误字咸未刊正，惟于评点致力耳。”（卷十九）木师即李盛铎。李盛铎藏书后多归燕京大学，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笔者曾向北大图书馆查询，于李氏藏书中未见此书。或已佚失，甚为可惜。

自从毛晋父子相继校刻之后，虽间有二卷本辗转流传于藏书家、校勘家之手，但世间通行的已是汲古阁所刻的三卷本，一般人几乎已不知道二卷本的《河岳英灵集》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所以误以与钟嶸《诗品》相比，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里还应谈另一种的三卷本，即涵芬楼《四部丛刊初编》的《河岳英灵集》。这个本子是据沈曾植所藏影印的，而据沈氏所云，谓此虽系明刻，实覆宋本。沈氏为清末民初的大学问家，他的意见应予重视。这里拟对此稍加论述。

沈曾植《海日楼题跋》卷一《明刻本河岳英灵集跋》云：“甲寅三月，借傅沅叔新得宋本《河岳英灵集》校于毛刻本上，字句异同颇多，其间亦有毛不必非、宋不必是者。宋刻误处显然，固不少也。六月中，复得此明本，乃知毛氏分卷，实祖于此。此前有刻书人小启，则覆宋本也。文与宋本不同者，往往与宋本所注一作者合，是此祖本尚在傅本之前。”按沈氏说以毛本校宋本，其间有毛不必非，宋不必是者，这是对的，但说他所得的这个本子为覆宋本，则不确。所谓刻书人小启，是在“目录”首行之后下半方有三行文字，为：“切见诗之流传于世多矣，若唐之《河岳英灵》、《中兴间气》，则世所罕见焉。本堂今得此本，编次既当，批摘又精，真诗中无价宝也。敬录诸梓，与朋友共之。

四远诗坛，幸垂藻鉴。谨启。”

笔者数年前曾就这个问题向陕西师大古籍研究所所长黄永年先生请教，黄先生于1987年12月来信谈了他的看法，今将他来信的有关部分摘录如下：“《丛刊》影印所用底本，即沈增植藏明本（即沈跋之本）。以目录前有所谓刻书人小启，指断其原本为南宋建阳书坊刻本（其书坊名称则已略去不刻或剝去不印），因谓是‘覆宋本’耳。然建阳之元刻本常有此类刻书启（南宋建本则较少有此类启，南宋临安书棚本更无此类启），而从其行款字体也只能是嘉靖时重刻，决非覆刻。过去藏书家对所藏善本之刊行时代多兴到夸大之语，不足为凭。”

黄永年先生是著名的唐史专家，又是有实践经验的版本目录学家。他在八十年代出版的《版本目录学概论》篇幅虽不算太大，却是十分精萃，有不少经验之谈和自得之见。上引信札中的一段话，通达详明，可谓确论。笔者曾以沈氏藏本与宋本及汲古阁刻本、毛扆校本通勘，发现凡宋本与汲、毛两本异者，沈氏藏本多同于汲、毛两本而不同于宋本。一些重大的歧异，如王昌龄的《江淮名山图》、《咏史》，如前面所引述过的，宋本与汲本、毛本有很大的文字差异，而沈氏藏本恰恰也同于汲毛两本。孟浩然《渡湘江》两首，沈氏藏本与汲、毛两本同样列于崔署名下。至于同为三卷，则更属于明本系统，不在话下。

当然，我们还可以拿现在已经确定的宋本别集与《河岳英灵集》各本比勘，看看沈氏藏本是否更接近宋刻。但情况也很复杂，不易确定。如常建诗，现在知道的有宋临安书棚本《常建诗集》，收入天禄琳琅丛书。这也是一个南宋本。其中《送李十一尉临溪》，宋本《河》集“轸起宫商调，越声澄碧林”，汲本、毛本都作“回轸抚商调，越溪澄碧林”，而这却与宋本《常建诗集》同，沈氏藏本则与宋本《河》集同。另一例子，宋本《河》集《闲斋卧疾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二首》，为五律二首，而沈氏

藏本却又与汲本、毛本同，题作《闲斋卧疾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作》，通为一首。在这一点上，宋本《河》集又与宋本《常建诗集》同。我们还可举出李白诗集的例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瞿蜕园、朱金城两先生编撰的《李白集校注》，以清乾隆刊本王琦辑注的《李太白文集》为底本，而以北京图书馆藏宋刊本《李太白文集》及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影印静嘉堂藏宋刊本《李太白文集》（即陆心源所宋楼藏本）相校勘。从校核中我们可以窥见两宋本的一些情况，并可以此作为依据来观察沈氏藏本文字的异同。如李白《蜀道难》，宋刻本《河》集有“六龙回日之高标”，沈氏藏本作“横河断海之浮云”，两宋本《李太白文集》同于宋刻本《河》集，但于此句下注“一作横河断海之浮云”。由此我们还可认为沈氏藏本有同于宋时之另一本处。但《梦游天姥山》，宋本《河》集有“使我不得开心颜”，王琦注本、两宋本同，而沈氏藏本则作“暂乐酒色凋朱颜”，文意大异。

这些异同的例子，数量很多，举不胜举。从这些情况可以得出什么认识呢？笔者认为，第一，同为宋刻本，因版本流传系统的不同，文字各有差异，以后世的某一刻本与之相校，将很难从某些异同中遽而得出此一刻本即为覆宋本的结论。第二，沈氏藏本在文字方面有一定的优点，但从整体来看，它是更同于汲本、毛本，它应是明刻的系统。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殷璠自编的本子为二卷本，这个本子一直流传到南宋，南宋中后期尚有刊刻。二、宋元之际或元明之际，二卷本的《河岳英灵集》已极少流传，几经失传。而自明代前期开始，即有三卷本出现。三卷本在流传过程中，亦几经翻刻，各本之间文字也颇有不同。三卷本与二卷本，分卷不同，字句有不少差异，但诗人、诗篇的数量是相同的。三、二卷本属宋本系统，三卷本属明本系统。三卷本有可能据宋时

某一刻本翻刻（非覆刻），因此在文字上保留了某些合理部分，不能因其明刻而尽弃之。四、我们今天整理《河岳英灵集》，应尽力追溯殷璠原编之旧，以宋刊二卷本为底本，参校几种明清时的刻本。当然，我们还可以所收诗人的别集来作参校，但这些别集本身版本各有不同的情况，如果都拿来校勘，则将不胜其繁而失却《河岳英灵集》本身系统比勘校核的意义。另外，《唐诗纪事》中有引殷璠评语的，当是计有功在当时见到《河岳英灵集》的一种本子，他所引述的，可以作为南宋时的一种版本来看待。《文苑英华》以及《文镜秘府论》所载殷璠叙，有现存《河》集各本所无的，也应补入。根据以上数点整理而成的《河岳英灵集》，将是较为完备的、可以作为研究依据的本子。

作者工作单位：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人文学系

（李珍华）

中华书局 （傅璇琮）

明进士徐文华字“用先”而非“用光”

《明史》卷191《徐文华传》载徐文华字用光，嘉定州（今四川乐山）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查明代万历《嘉定州志》、清代康熙《嘉定州志》、嘉庆《乐山县志》等，均记“徐文华，字用先”，与徐文华同时代的诗人杨慎在其诗文中也称徐文华为“徐用先”。“用光”与“用先”，孰是孰非？笔者近期查阅到《封文林郎监察御史徐公墓志铭》碑刻的拓片，铭文曰：“公（徐文华之父）讳大寿，字静甫。其子文华用先，起家进士，……。”墓志铭的作者安磐与徐文华为同时代人，且是挚友。由此可确证徐文华字为“用先”，《明史》记为“用光”疑因形近所误致。

· 毛西旁 ·